

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

布兰德利·沃马克◎

【内容提要】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一文将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经验与有关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均衡关系的一般性论断结合起来，从这两个维度看，这种历史经验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其适用性仅仅局限于前现代的东亚国际体系中。朝贡体制假设中国在一个有限互动的亚洲世界中处于中心地位。更具一般性的论断也对非对称性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东亚的历史表明，管理非对称性关系有着许多基本的挑战和经验，可以宽泛地运用于当今世界。尽管东亚不再处于等级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的各个不平等的行为者之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非战国或冷战时期两极状态下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

【关键词】 非对称性 朝贡体系 均衡

在《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一文中，周方银对中国与其邻国传统的外交互动模式，给出了一种博弈论视角的阐释。这样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也颇为有趣。^①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总是大国操纵小国，而他的分析

^①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2011, pp. 147-178.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1期（总第33期），第33—5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恰恰反驳了这种观点。然而，他对于朝贡体系的解释并非立足于儒家道德的文化，而是将朝贡体系看做冲突互动过程所产生的一种能够使中国和其邻国相互适应的模式。

周方银正确地强调了朝贡体系的双向性特征，以及它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外交中的关键作用。相比费正清，他认为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贸易关系的外交庇护。通常人们认为贡品是大国要求小国进贡礼品的一种形式，而周方银则强调了中国的首要利益是通过一定的让步与其周边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的确，在周方银的论述中，中国处于朝贡关系中不利的一边：疲于冲突便向其邻国作出一定让步以使边境安宁。周方银给朝贡体系提供了一种清晰而合情理的互动模式的解释，并对复杂而有趣的互动过程——这种过程能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间达到一种均衡——进行了案例研究。这一研究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历史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我们在大国与其弱小邻国间关系的一般理论中，将中国当做其中的一个特例，便会取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一种分析模式来看中国的外交史绝对是很有用的，但是追求必要的简约也许会忽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独特特征，而这些特征或许比一般化的特征更能揭示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本质。同样的，用一个一般性的模式来阐释某一案例，即便该案例与模型十分吻合，仍不能证明这一模式是普遍适用并且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周方银的模型的一般性问题，而是集中在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历史方面。我认为，中国作为亚洲地缘中心国家的地位比这一地区实力的非对称性更能对中国与其外部世界关系的形成产生基础性的作用，并且在中国有些朝代和皇帝曾追求过与朝贡体系的主流相反的政策。周方银认为均衡的产生源于操纵小国的消极后果，与之相反，我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这一实例加进来以证明小国的抗衡能力是一种均衡（这种均衡并非基于操纵）能否出现的关键因素。在周方银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阐述中国传统外交与现在中国重新成为亚洲主要大国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章的第二部分试图把周方银关于均衡形成的观点置于一个关于非对称国家间关系的更一般化的模式之中。周方银强调了互动进程以及稳定结果的形成，而非政治操纵，这是重要的贡献。然而，他的分析只局限于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视角。我给出一种关于非对称国家间关系的更普遍的模式。这一模式从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错误知觉以及调整过程的分析入手。

文章的最后结论是，曾经的中华帝国在处理与其小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远比战国时的合纵连横或冷战时的两极格局更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局势。

一、中国的中心位置

在中国朝贡体系的历史评价中，已有太多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并非仅对其内容的质疑，有些学者甚至质疑它的存在。尤其是在这些质疑者中甚至有提出朝贡体系这一问题的伟大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探讨中国外交的著作的导论中，费正清把朝贡体系称为“古老的神话”。^① 许多人将朝贡体系看做中国在执著追求其自我利益时的修饰。^② 另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处理的是与其北方势力的关系，^③ 这些北方势力中国一时无法征服，有时中国还向它们进贡。^④ 朝贡模式无法涵盖元和清对中原的入侵，也无法涵盖中

①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② Chusei Suzuki, "China's Relations with Inner Asia,"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180 - 197.

③ Owen Lattimore, *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velyn Rawski, "Chinese Strategy and Security Issu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④ Wang Gungwu, "M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Mot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04; 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20 - 33.

国北方边缘地带兴起的许多王朝。最后，一些王朝（尤其是元朝）和一些帝国时期（比如明永乐时期）的行为并没有遵循周方银所提出的那种模式。

我们怎样才能调和周方银的观点和案例与历史事实的偏差？我认为，中国在亚洲不确定的地缘中心地位比其实力优势更能对其周边关系产生基础性作用。^① 传统西方有一个“液态中心”——地中海，大的政权都先后围绕在其周围。与此相比，中国是亚洲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固态中心”，它的中心地理位置已成为统一时期中国优势力量的来源和中国孱弱和分裂时期邻国觊觎的对象。中国的资源中心地位也解释了周方银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外交往来是防御性的。^② 极力扩张到一个富强的中心之外会使回报不断减少，成本不断增加。相反，邻国在从与中国的和平互动中获益的同时也会羡慕和希望拥有它的土地和财富。

就像康灿雄说的，中国与稳固的王国（最有名的是朝鲜和越南）间的关系和中国与其西北边疆游牧族群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③ 究其原因，有几方面。草地为游牧者提供了迁徙的便利性和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同时，缺乏可观的农业生产基地使他们把对中国的嫉妒变成偷袭和抢劫。相反，定居的王国在与中国的冲突中输不起，而偷袭却相对来说所获甚少。因此，中国近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军事冲突都是和游牧者进行的，而稳定的朝贡关系的最好例子则产生在中国与那些定居的王国之间。

这些例外和不同点并不能证明周方银的观点无效，但他们却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在一个中心位置上发挥作用，尽管通常是防御性的。它可以治理它的边疆，却不能解决与其邻国间的问题。周方银

① Brantly Womack,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 in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2010), pp. 153–182.

②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51.

③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所引用的文本指出，消灭惹是生非的邻国常常被后勤保障问题所拖累。随着中国军事力量从中心向更远的地方扩散，物资供应的难度加大，发病的风险增加。由于中国处于地理中心，中国的帝国过度扩张模式与西方的不同。诚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西方帝国的过度扩张使它们在外来挑战者面前显得更脆弱。^① 在中国这一例子中，过度扩张导致了衰退和对于周边的控制的丢失，以及偶然地导致了过度紧张的中心秩序的崩溃，但是最终出现的新秩序将一定同样地掌控着中心位置，这是由于其丰富的物资和众多的人口。在西方，帝国及其首都不断变更，罗马取代雅典的地位。在中国，则是王朝一个接一个的更迭。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亚洲的中心地带是固定的，无法变更的，中国把上一朝代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的能力要强于帝国更替有断层的西方。周方银给出一些极好的明确的关于影响政策的历史案例。^② 至高无上的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很可能同等地有价值的另一部分是由王朝历史提供的。儒家思想决定了那些必须要去学的价值理念，而前朝的历史模式同样提供了可被学习的课题。因为中国历史的变迁大致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和相似的条件下，周方银发现的均衡是在不断起着实际作用的潜规则，并成为中国外交文化的一部分。^③ 到明代，朝贡体系从一种互动模式发展演化成为自觉的和机制化的外交形式。

二、中越关系的案例分析

从宋朝到清朝的中越关系可以被纳入周方银关于缅甸和朝鲜的案例研究中，用以说明潜藏在中国与邻国保持均衡背后的现实以及双方互相学习

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②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77, note 83.

③ 历史在中国外交中的影响令亨利·基辛格印象深刻，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2011)。

的过程。^① 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纠葛催生了谨慎的外交政策，这使得南部的越南的自治权在公元 971 年得到承认。^② 尽管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但边界最终固定下来，并从那时起大体上保持了相同的边界。^③ 宋朝加强了对广西的控制，它还获得来自越南和占城（Champa）——越南的对手，位于今越南的中部——的贡品。^④ 越南和占城之间争斗激烈，但它们都不愿冒险使中国介入。^⑤

蒙古人蔑视宋朝的软弱，他们自己的力量建立在不停地扩展其军事统治的范围之上，建立在征服而非防御之上。越南对宋那种官方层面的顺从对元朝来说是不够的，忽必烈汗要求越南对元朝臣服。这样元朝不仅对越南的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而且对越南作为独立于中国的一个国家的身份也是一个威胁。越南的部分回应是将其定位为一个南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属国，它有自己的历史和自治权。^⑥ 另一个回应是不断击退元的侵略。当顺从都不足以保存其自治权，反抗就成为必然。正如一个过度扩张的西方帝国，元在东征日本和南讨东南亚失利后已达它军事统治力的极限，这削弱了它在东亚建立的秩序的整个结构。然而，这里并不像西方帝国间的更替，元之后是另一个朝代而不是外来的挑战者。

明太祖一定从元朝过分扩张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在他指定的“祖训”中，他建议他的继任者：

①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Keith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③ James Anderson, *The Rebel Den of Nung Tri Cao: Loyalty and Identity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④ 关于广西及壮族，可参见 Jeffrey Barlow 的电子书，*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http://mccl.pacificu.edu/as/resources/zhuang/>。

⑤ James Anderson, “From Tribute to Trade: Examining a Pivotal Period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提交给亚洲研究会东南亚研究 2003 年年度会议论文。

⑥ O. W. Wolters, “Assertions of Culture Well-Being in Fourteenth-Century Vietnam: Part I,”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2, 1979, pp. 435–450; O. W. Wolters, “Assertions of Culture Well-Being in Fourteenth-Century Vietnam: Part II,”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1, No. 1, 1980, pp. 74–90.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

这一段话是对中国统治能力极限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能认识到局限是朝贡体系机制化的智力前提。有一个和平的边境局势的关键并不在于统治邻国，而是经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周方银对于中国和缅甸^②以及中国和新罗^③之间的均衡关系的描述也正符合这一模式。

永乐帝并没能遵循其父的训诫。1407年，他攻占越南并试图让它再次依附中国。当然，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在越南，胡朝已经推翻了被中国承认的陈朝，并把护送陈朝使者从南京归国的中国卫兵屠杀。当然，在胡朝看来，向中国顺从是毫无理由的。元政权已被击溃，占城再次成为越南最大的对手和威胁。^④但是，胡朝对中国的侮辱促使永乐大帝将越南变为明帝国的附庸。

1407年，明朝很容易的再次征服了越南，但是到1427年，让越南附属于中国已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对外部管理的需要促使越南人在黎利（Le Loi）的带领下团结起来，进行旷日持久的爱国性抗争。对明朝来说，平定一个帝国新征服的不太值得要的部分实在是一项不讨巧的事情，而对越南来说，这一场殊死的战斗将帮助它确定越南政治共同体。爱国学者阮彖街（Nguyen Trai）在他的“平吴大诰”中像14世纪的历

① 引自 Wang Gungwu, "Ming Foreign Relations," pp. 311–312.

②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64.

③ Ibid., p. 172.

④ George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 East Asia*, Walter Vella, ed., trans. Susan Cowing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8).

史学家那样，大肆炫耀与中国的历史性平等的宣言。^① 刚通过游击战击退一次攻占，阮豸街同时强调了人们及他们的遭遇和他们对抵抗的支持。黎利的力量和伟大在于他对人们的关切，这样，他战胜了明朝。阮豸街以黎利的口吻说：

把我们的旗帜挂在一根脆竹竿上，
我从民众中集结武装。
他们喝我的酒我喝他们的水，
我们像父子一样，
万众一心的士兵。^②

元朝的威胁促使越南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发出声音，明朝的占领推动了进一步的国家动员。在越南人的意识中，从宋代开始就有确定的政治实体。

尽管明军在 1427 年被彻底击败，但从主权平等的现代意义来讲，越南并没有获得独立。带有顺从性的自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黎利小心地将明朝的将领及其马匹送回北京，并为明在越南遇到的挫折向明致歉。过了适当的一段时间，明朝承认了黎利是越南的合法统治者。常规的朝贡任务恢复，越南儒教的黄金时代也从黎利的继任者黎宗圣（Le Thanh Ton）开始了。^③ 由于北方边境安全了，越南摧毁了占城，并发动了向南的历史性进

① 这一宣言全文的翻译，可见 Nguyen Khac Vien, *Vietnam: A Long History* (Hanoi: The Gioi, 1993), pp. 81 – 86; 也可见 Truong Buu Lam,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 – 1900*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1, 1967), pp. 54 – 62。关于宣言的细致的文本解读，参见 Stephen O'Harrow, “Nguyen Trai's Binh Ngo Dai Cao of 1482: the Development of a Vietnamese National Ident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1, 1979, pp. 157 – 174。

② 引自 Stephen O'Harrow, “Nguyen Trai's Binh Ngo Dai Cao of 1482,” p. 173。

③ John Whitmore, “Northern Relations for Dai Viet: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Le Thang-tong (r. 1460 – 1497),” in John Whitmore and James Anderson, *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 Two Millennia of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

军。对中国而言，战败确认了它的南部边界。^① 越南从此不再被视为中国丢失的一部分。均衡在此实现。

这样，关系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了，相反，局势则需要进行管理。尽管 1427 年以后的中越关系在四个多世纪里保持了相对和平，但它绝不是一个例外。朝贡体系是互相确保常规化，不管在 1407 年还是 1788 年，战败后修复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然而，这一体系并未消除不平等问题，它仅提供了一个管理框架。中国仍试图入侵，越南仍假装平等。越南皇帝试图摆脱在国内至高无上而在外部顺从北京的困境。在明入侵之前，陈朝将小孩任命为名誉上的皇帝而让原来的皇帝继续执政，这一策略既解决了继承问题又意味着跟北京官方打交道的是小孩。而且，从陈朝开始，越南皇帝在与中国的外交信函往来中使用错误的名字。^② 越南人在北京或是在去北京的路上时，越南是属国。而离开北京或在越南时，越南和中国就是平等的。在维护其利益和自治权的时候，越南上演了新的顺从，中国则接受了顺从仪式作为事实并力避冲突，保持了其官方的平静态度。朝贡体系是一种相互确认而非主权平等。

为什么朝贡关系在当今时代不能继续存在？有两点根本的原因。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西方的入侵，但是西方的介入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其舰船的火力和帝国主义者的贪婪。如果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亚洲将进入更大的、全球互动不断增加的世界。在殖民主义以前，越南的内部斗争由于法国的介入而呈三角化。在西方传教士获得军事保护之前，他们在亚洲的作为就有重要的文化影响。即便没有百年耻辱，亚洲也已经经历了去中心化的世纪。亚洲视线的扩展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剧增和全球化使得中

① 在越南皇帝的要求下，清军确实于 1788 年进入越南。但是，在西山起义的阮文惠（Nguyen Hue）打败黎朝之前，清军已经奉命退回中国了。Truong Buu Lam, "Intervention versus Tribute 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788 - 1790," in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165 - 179.

② Nguyen The Anh,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as the Two Contrasting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提交 2001 年香港大学“中国与东南亚：历史互动的视角”研讨会的论文。

国的力量变得不那么显著了。因此,其邻国都将注意力投向其他地方。^①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被边缘化的国家,最终成为一个异质的世界体系的最大受害者。

朝贡体系的第二个致命缺陷是它不能管理好不断增强的关系。本质上,朝贡体系的目的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不平等的伙伴关系。由于这一体系不承认彼此利益的差异,也不允许就这些利益公开地谈判,和谐的关系最容易通过单薄而遥远的官方关系得以保持。商业能够在双方政府都忽视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给西方帝国主义的卷入创造了空间。当朝贡关系出现困难时,减少接触要比公开地解决分歧要来得容易。明清两代可以对逐渐发展起来的私人贸易视而不见,而对中国人潜出境外之外疑虑重重。^②可是西方国家和商人没有平等地对待亚洲国家,而是把它们当做贸易的对象。这样,郑和庞大的船队最终被抛弃,而西方小商船的到来却不断增加。

朝贡体系的这两个缺陷是天然地存在内在联系的。因为中国是中央国家,它觉得很少有必要与周边国家发生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常常是麻烦重重。因此,在外部关系的困难增加的时候,中国转向内部就具有更大的诱惑性。但是,作为处理关系的一种策略,“孤立”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的自给自足。中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世界上没有重要性超过中国的国家)如果不正确,它就会被远处国家攻其不备。这种事情恰恰发生了。由于中国的邻国被吸引或被迫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仅仅是自己的中心而不再是亚洲的中心。当舰船抵近中国海岸的时候,中国内部才具有的中心地位也受到威胁,并最终坍塌。

三、非对称性和均衡分析

周方银论证了朝贡体制下不平等的关系能够达到互利互惠的均衡状

^① John Wills, "Qing Relations with Annam and Siam," paper delivered to 18th IAHA conference, Taipei, 2004.

^② Wang Gungwu, *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态，而中越关系则为其提供了另一个论据。事实上，1427 年之后的“长期和平”可以被视为一种成熟的传统外交关系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下，双方都了解朝贡体系的效用，也都知道各自所处地位的不足之处。但是历史上亚洲的朝贡体制的局限性也表明，中国与不平等的邻国可以形成的不只是一种均衡结果。因为即使朝贡体系分崩离析，相邻国家之间仍旧是不平等的。正如先前描述的那样，朝贡体系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地位构成了对它的保障。伴随着现代的到来，亚洲的视野也在扩张，中国的邻国之间开始建立了相互之间更为重要的其他类型的关系，而中国本身则变得更羸弱，秩序也更混乱了。

然而，均衡模型也有一个理论上的局限。当该理论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构成一套似乎可信的解释的时候，该理论本身更像是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一种一般性理论。此外，该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进行阐释的，而中国恰恰总是这些关系中最有分量的一个。为了超越朝贡体系的这一特例，并且从较小参与者的视角进行分析，构建一个非对称关系的一般性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下文将简要介绍一下非对称理论，这将有助于在宏观框架内给均衡分析方法确立理论的坐标。^①

任何非对称关系中最基本的特点是，与关系中势力较强的一方相比，较弱的一方更容易受到影响。这种差别影响着双边关系中的各个层面。非对称性不仅仅是一种安全关系。即使双边互动（比如说货物交换）表面上是平等和自愿的，在很多时候却也是不平等的，对弱国的影响远甚于强国。因为弱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利益，而强国可能会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关系，并且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强国都会更为关注国内问题。应该指出的是，非对称关系中彼此视角的差异不仅仅是政府态度的差别那样简单。对于整个政治共同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黎利很容易调动越南人的爱

① 非对称理论的总结，可参见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4。这一理论在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地区大国与小型战争等问题，可参见 Brantly Womack, *China Among Unequals*；也可参见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58—66 页。

国热情，因为这些越南人都感觉受到了威胁。

非对称性所暗含的利益上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观念上的不同，并最终导致了行为上的差异。弱国更为在意与强国的关系，因为它们的得失程度比强国更为剧烈。弱国的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强国的行为，所以它们也更倾向于调整行为，能够更快地对强国作出反应。与弱国相反，由于人口和国内权力对强国来说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们对于与弱国的关系并不是很在意，协调其行为的意愿也没有弱国强烈。

但是这种对两国关系关注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弱国更为强烈地关注彼此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更好地理解两国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弱国时刻感到威胁，它们就很有可能将强国不倾向于做协调的意愿误解为强国在酝酿某些更为长久或是有恶意的计划；另一方面，作为更为警觉和更协调的一方，弱国能更迅速地抓住机会。这就与周方银的结论相吻合，即当强国采取怀柔政策时，弱国就会去尽力攫取利益。

同时，强国有一套不同的行为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误解。正常情况下，强国为消除弱国骚扰而采取措施的结果往往是付出大于收益的。强国之所以表现出容忍，是因为如果力求解决与弱国的每一桩小纠纷，会给强国造成更大的困扰。当然，两个国家间的危机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强国只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注意到行为的调整，所以这也只被视为解决危机而不是因为了解到了弱国的处境。强国会倾向于运用其强大的能力胁迫弱国以使其行为符合强国的要求，以此来解决危机。此时，由于受到强国武力的警醒，弱国会产生一种更为强烈的危险意识。所以当强国稍微出兵的时候，弱国就会有大军压境的恐惧，尽管强国这么做，仅仅是想让弱国的行为重回到原来的规则中。当强国仅是想解决危机后重新将精力投入国内事务时，弱国则更有可能视其为致命的威胁。

这就是均衡分析适用于非对称理论的原因。正如周方银对中国与缅甸和朝鲜开战的描述所论证的那样，强国想要惩罚一下弱国。因为实力上的差别，强国就会认为所要付出的代价会很小并且行动很快就能结束。对于强国来说，惩罚仅仅是一次“征伐”，一场“小型战争”，一次“政治行

动”，一个“和解过程”，或是给弱国的一个“教训”。而从弱国的角度来看，强大邻国的这种敌意就是致命的威胁，它们只能选择抵抗，并且全民都强烈地感知到了这种威胁。缅甸，^① 高句丽，^② 新罗^③和越南黎利的意外胜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更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他们处于背水一战的处境当中。中国可以撤退，但是它们不能。当强国一方的好战分子以为代价很小并能很快赢得胜利而成功发动战争的时候，弱国就开始准备拼死一战。即使弱国的资源更少，它们也会艰苦持久作战；即使它们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它们也会决战到底，因为它们没有退路。战争消耗上的增大和时间上的旷日持久侵蚀了好战派在国内的威信，这也大大超过了领导层所愿意为之付出的限度。缅甸和新罗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些小型战争的描述不仅能阐释朝贡体系，而且，也能有效地说明现代的非对称性冲突，如美国与阿富汗的冲突。

只要是双方的基本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双方就都愿意结束冲突。强国的基本利益是与弱国的和平相处不会侵害其安全。强国想让弱国承认其既存权力地位，并能够在行为上谦恭一点。但谦恭不是服从，毕竟，强国没能实现其操纵弱国的意愿，同时它也包含了希望弱国不要挑战这种权力关系的意愿。而弱国则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国对其身份和利益的认可，弱国需要大国能够保证不再试图入侵或是操纵弱国。一种成熟的非对称关系可以源于双方对于对方自治权力的尊敬认可。因此，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将双方对于对方自治权力（通过封印和官衔体现）尊敬认可（对于北京来说，这种尊敬认可就是对方进行朝贡）的仪式化后的状态。

从小型战争中收获的教训能够告诉双方，需要更多地从对方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考虑到视角上的结构性差异，双方对于和平持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诧异的了。就中国来说，实现均衡实际上就是中国单方对弱国容忍的过程，其目的仅仅在于避免与其发生冲突。正如周方银所说，

①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64.

② Ibid., p. 168.

③ Ibid., p. 172.

这是一个怀柔的过程，也能对外展示出帝国的宽宏大量。但是，在弱国看来，均衡既是对本国身份国家层面上的确认，也是对机会务实的追求。尽管双方的说法不同，但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均衡的达成也可以被理解为出现僵局的结果。因为没有一方能够单独达到目标，因此和平就成了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在取胜或战败均不太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一种临时的过渡方案也就得以达成。

这里对非对称理论所作的阐述与周方银论证所用的博弈矩阵（见图 1）是截然不同的。

		周边邻国	
		骚扰	臣服
中国	怀柔	A	B
	征伐	C	D

图 1 实力不对称格局下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策略互动

资料来源：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62。

如果我们深入的探究一下周方银描述的征伐策略，我们就会发现，征伐策略并没有导致弱国的臣服，而是导致了中国与邻国的僵局状态，是这种僵持的状态使双方达成一致。称邻国“臣服”于中国不免有些夸张，每一个邻国都处在一个战术强、战略弱的位置上。因此，每一个邻国都愿意对中国表示仪式上的恭敬以换取中国对其自治权利的承认。此外，与中国边界的和平状态使邻国也能有精力应对来自其他方面的冲突。所以，对中国的恭敬并不是臣服，实际上恭敬的基础是能获得中国对其自治的承认。同样，邻国的“骚扰”也只是一方对于彼此利益冲突的描述。中国与邻国边界的大部分地区两边都跨居着少数民族群体，人口的变化和中央对边境控制能力的反复变化决定了跨居群体流动的方向。毕竟缅甸人最早是从云南移民过去的而汉族却不是。同样，永乐皇帝对于试图重新吞并越南有其自己的借口，但其主要目的却不是平息来自越南的骚扰。最后，用

“怀柔”一词描述非战争的状态则有些狭隘。朝贡体系下的谈判协商并不是公开的，但是从暗含在宋朝对云南南朝^①和越南的态度中的容忍来看，这表现出的是对他们权力限度的承认，而不是对其怀柔。元朝一改这两种政策而发兵南方并在云南取得胜利，但是在越南却遭遇失败。

或许，非对称理论对于周方银的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一些邻国的关系维持在 B 象限，即怀柔/臣服阶段。如周方银所揭示的那样，即使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 $B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rightarrow B$ 的循环，中国的邻国还是倾向采取 A 象限策略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在 A 象限中，周边邻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骚扰中国获益，是由于无论是 A 象限还是 B 象限，它们都没有遭受惩罚。然而，按照周方银论文里面表 4^② 中列举的例子所进行的阐释，有很多重要例子都能证明 B 象限的稳定关系。如果朝贡关系维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则这种稳定必然已成为中国与邻国的共识。非对称理论认为，在双方都认识到冲突会危害它们利益的基础上，双方用可接受的方式交换各自对对方的恭敬和认可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稳定。一旦邻国表现出敌意或者是中国认为征伐是简单有效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将被改变。然而，大多数稳定的非对称关系是僵持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成功的骚扰或是成功的征伐。因此，成熟的非对称关系更有可能是稳定的。

朝贡体系成为证明非对称理论的一个最佳案例，因为它包括了邻国之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双边关系。距离能够减弱非对称关系的影响，比如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国家发动的“小型战争”也能由于因为受到遥远小国的抵抗而遭受挫折。并且非对称关系也绝不是引起误解和敌意的唯一原因：相同的政治体系之间更不可能爆发冲突；^③ 领导人和意识形态可能是倾向于扩张的；对资源的争夺也有可能引发冲突。在当非对称理论用于分析非对称的三角关系和其他多边互动的情势，将会变得更为复杂。国家关系中的非对称因素将明显增加理解的差异和行为上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将

①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 177, note 83.

② Ibid., p. 156.

③ John Owen, *Liberal Peace, Liberal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有助于解释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对于理解邻国间的双边关系也将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所有成熟的非对称关系都有着朝贡体系的某些特点。第一，这些关系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关系却没法简单地锁定下来，或者被轻易地解决掉。非对称关系仍旧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这一点在周方银的第二个朝鲜的案例，即光海君的案例中得到了很清晰的体现。^① 由谁来作为朝鲜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个复杂的问题以及明朝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失误决定疏远了与光海君的关系，而光海君反过来又援助了对明朝形成挑战的后金。但一般说来，无论双方怎么对对方表示出尊重和承认其自治权力，国家之间仍有一些必须解决的利益上的分歧。尽管安全不再是邻国之间的一个威胁，如美国和加拿大，但是利益的冲突却仍旧存在。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加拿大仍将对美国的行动高度敏感，而美国对加拿大的关注却愈发减少。

第二，仪式对于成功的调节有着重要作用。双方均需要定期、官方地对稳定关系进行确认，并承认这种关系下所蕴涵着的尊重对方及其自治权力。北京宫廷隆重的庆典与如今高层首脑会议的景象表面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两者的内在目的却很一致。因为双方对彼此关系的看法是相当不同的，所以公开展示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就为两国维持关系提供必要的保证。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空洞的仪式”被视为不过是个摆设，然而仪式的主要作用却是对于常态的正式确认。

第三，当双方搁置争议的时候，非对称关系就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考虑到在非对称关系中双方相互误解的这种倾向，一次激烈爆发的争端就可能为两国关系划上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朝贡体系下，通过回避争端议题和中国的自我封闭可以最终促成中立状态（neutralization）。在现代非对称关系中，双方之间的稳定最好是通过派专家使者对争端进行谈判并就争端区域达成行为准则来实现。而且，必须将争端置于双方

^①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pp. 172 - 174.

均可接受的准则框架下，双方才有可能从公开的激烈政治对抗转向双方专家间务实的谈判。如果一个问题不能被中立化，比如像中国南海那样的主权争端，那么双方的共同利益就是避免争端并就争议区域进行行为准则的谈判。

第四，在稳定的长期的非对称关系的众多因素中，习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习惯是均衡带来的感觉上的一种副产品，它稳定了双方对未来关系的预期。和平时期越长，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基于稳定关系基础上的国家间利益交织也就越密切。尽管国家间误解和利益冲突仍旧可能出现，但双边持有的共识是，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并且也是无益的。尽管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制造出紧张情绪，但以往危机的经验使人们确信，这一次危机也能够得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危机和冲突会威胁到业已建立起来的非对称关系基础上相互交织的利益。最后，习惯是国际关系中共同文化的基础，因此，习惯当然也就是如康灿雄所称的东亚等级文化的基础，^① 同时既是温特的康德式的文化气质，^② 也是英国学派社会状态理论的基础。^③

第五，如果把习惯看做非对称关系的保障，那突破陈规就是非对称关系最大的危险。比如，在 1407 年越南的案例中，两个因素——中国新继位皇帝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和越南疯狂的骚乱——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当两国的关系是新建立的或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需要重新建立的时候，此时要达成的交易就在历史棱镜的作用下被放大和扭曲了。而这种历史棱镜作用并不是由以往盛行的惯例塑造的，而是一方面由不同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由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广泛的思考造就的。突破陈规对于消除误解和冲突既不必要，也不会有效。一些新的形势可能会得到妥善处理，同时由

①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于对危机处理不当,一些历时长久的国家关系也会陷入混乱。因此,在非对称关系中,突破陈规构成孕育危机最为肥沃的土壤。

四、结论:超越朝贡体系、战国 体系和后冷战体系

中国重新崛起为亚洲的中坚大国使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目前所处的实力地位是否与其近代对外政策模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虽然周方银的文章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在当前对朝贡体系和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天下”概念的日益关注,已深深根植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思考中。

很显然,在当今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或其他国家建立一个类似于朝贡体系的全球体制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与从战国或是冷战中吸取的教训相比,调整朝贡体系下非对称关系所获得的经验对当前中国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人们很容易转向战国时期涌现出的优秀的道德和军事思想寻求思想资源。当然,孙子、老子、孟子和其他与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很多的观念和看法。这些观念对各个时代、各种国际环境来说都可资利用。然而战国却是一个邻国相向的年代,因此,结盟如著名的合纵、连横,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就十分必要。在当今世界,尽管国家间存在很多差异,却很少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除了因历史争端导致延续至今的主权纠纷外,现在国家的边界往往是稳定的。国家利益和公众观念的不同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煽动起强烈的情绪,即使是超级大国采取最有攻击性的行为,它也不会设定目标要消灭一个国家或是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并没有变成殖民地。

为什么当今时代没有成吉思汗或是拿破仑来重新塑造当前的世界?并不是因为领导人更遵守道德了,而是因为下面这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核武器对大国的核心利益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另一个是全球化加深

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这大大增加了进攻侵略所带来的间接损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它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同时它也就越担忧其行动可能导致的意外结果。国家及其民众仍旧会担心致命威胁的存在，但实际上，国家间的模式和结构很可能大体上已经固定了。虽然政权更迭确实存在，但这种更迭更有可能是由国内政治所导致，而不是源于外部入侵。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分裂为几个加盟国家独立的状态，随之而来的新建国家之间的战争并没有改变各国继承下来的边界。

因此，与战国时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现代国际政治体系是由一组稳定的行为体构成的。这些国家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它们的政府经常更换，国内有民族主义情绪，但它们却不会合起伙来去攻打另外的国家。它们最想要的是政权的更迭，但是它们往往不得愿。与相互排斥的结盟相比，在一个稳定的、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国家间相互包容友好是一个更为可取的政策。中国实行的睦邻友好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向邻国一再地保证不会威胁它们的核心利益，也不会限制它们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举一个反事实的历史例子，如一些人所担心的，如果中国在 1991 年与越南结成意识形态的同盟，那么中国和越南与东盟的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张；同样，在 1995 年，如果中国尝试阻止越南加入东盟，那么中国与越南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受到持久的损害。无论是多边发起的东盟“10 + 3”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都采取包容性的友好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与排斥性的结盟相比，包容性的友好关系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世界下，国家之间仍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对其邻国和未来仍存在着忧虑。各个国家都想要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但同时各国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果一国与其伙伴国合伙对付另外一个国家，或者一国依靠另外一个国家而忽略其他国家，这样的国家将在全球参与中遭受到潜在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能与另一个国家和睦相处，但同时又不谋求一种排他性或优先性的关系，那么这就将加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又不会阻碍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如果在 21 世纪征服别国或者采取其他冒险方式是不可行的话，那么最为理性的国际姿态就是在开

放的关系结构里相互确保彼此的核心利益。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经典的博弈论著作中所探讨的那样,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互动中,最为理性的、应当作为首选的策略就是合作。^①

将现在中国所处的情形类比为冷战的情形,似乎是颇为合理的,但是就如同把它类比为战国时期的情势一样,都是具有很强误导性的。之所以这种类比貌似合理,是因为很显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将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没人认为两国会建立相互信任的紧密关系。冷战为两个世界性大国的双边对抗关系提供了最新的、鲜明的例子。

然而中国不是苏联。苏联致力于一种保护性的自我孤立之中,它使其国家经济军事化,操纵东欧事务,恐吓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其外交关系一直受敌视美国者所主导。美国当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其经济没有仅为军事服务,其国际关系也更为开放。对美国来说,遏制苏联会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苏联孤立了它自己。美国没有建立柏林墙。最终,苏联从内部解体,由于自己的孤立开始失去活力。

1979 年之前,中国也是自我孤立的,国际上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但是在改革时代,中国道路却与苏联截然相反。中国强调互惠互利,愿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走结盟道路。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繁荣表示欢迎,因为它们也会从中受益。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环境在 2008 年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爆发而开始改变。中国的绝对增长并没有增加,其基本政策也没有改变,但是其相对增长和稳定却与其他国家所遭受的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结果,中国的小伙伴们变得更忧虑其意图,美国也开始将中国视为全球竞争者。同时,中国对于美国潜在敌意的忧虑也变得更强烈。因此,中国对于奥巴马总统试图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更为敏感。中美两国有很多人认为两极格局将不可避免。

然而,如果像冷战一样,由于双方核武器的毁灭性危险的存在而排除两极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那么两极间的竞争又由什么来决定呢? 在

①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Penguin, 1990).

朝鲜、印度支那和阿富汗爆发的间接战争对于发动战争的超级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同样，迫使小国如伊朗、索马里、安哥拉和古巴结成同盟或者防止其反叛，对超级大国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美国最成功的外交从政策上来说是利用马歇尔计划经济支援欧洲，在更为广泛意义上说是其开放的政治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互动。

美中竞争的结果和特点都将取决于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如果中国将从邻国身上强加获益或明显很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邻国将减少与中国互动以阻碍其获得利益。即使在一种确定的非对称关系中，小国也会尽量减少受到双边影响，但是如果它们一旦不确定大国的意图的时候，它们就会为敌对做好准备。如果它们确定它们的身份受到了威胁或者它们的利益将受损失的时候，它们将开始由追随中国转而制衡中国。其他国家因为担心与中国在利益上将格格不入，它们也将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如果发达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新的、充满敌意的霸权的诞生，它们就会表现出防御的姿态。如果“中国威胁论”被认为是一种误解，而中国发展外部关系也是积极善意的，那么对中国怀疑和充满敌意的态度就会缺少国际支持。然而，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充满忧虑，它们就会团结起来保护既有的国际体系不被一个新崛起的、更具威胁的国家摧毁。如果中国的表现增加了其他国家对它的疏远或者其他国家的抵制，那么这无疑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

全球竞争并不总是充满敌意的。2002年，中国成为第一个签署《东盟友好条约》的非东南亚国家，紧接着印度和日本也签署了此条约。最终在2009年，美国也签署了该条约。美国签署该条约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竞争意识，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但是中国和东南亚均从这种竞争模式中受益。同样，美国在国际赈灾事业上的成功可能刺激了中国在2007年建造“岱山岛”号医务船。大多数的软实力竞争给接受方提供了收益和有利的环境，而没有迫使它们做出痛苦的选择。

很显然，曾经的中华帝国的国际环境与21世纪多节点的全球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与战国时期不同，现在的中国得与各种各样的邻国建立稳

定的关系，还要尽量避免卷入它们之间的争端。并且不同于冷战时期双边的敌对状态，中国将靠安抚和软实力而不是通过武力和操纵他国事务来领导世界。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来管理非对称的关系。正如周方银所说，朝贡体系下制度化的非对称均衡的智慧也常常被打破。当前的时代为人类呈现出如下的景象：几个力量强大的主权国家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内进行着激烈的碰撞。需要再度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优势能力的限度，同时，在非对称关系中，国家间需要相互使对方安心。

(温卫杰、万鹏 译，林民旺 校)

作者简介

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1998 年在四川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1 年在云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 年在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jianboluo@sohu.com

布兰德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与外交事务系教授。1969 年获达拉斯大学学士学位，1973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77 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专著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 年)》《中国与越南：不对称的政治》等。

电子信箱: Brantly@gmail.com

陈麒安 2012 年在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2004 年毕业于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电子信箱: chen0917@gmail.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 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刘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2012 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dxlibrary@yahoo.cn

黄若川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生，2011 年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iphrc@yahoo.com.cn